

论乡土观念对近代东北移民会馆的影响

◎韩佳利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乡土观念极为深厚,对于东北客籍商人而言,乡土观念更具备较为特殊的意义。清代以来,伴随着东北移民潮的出现,东北移民会馆应运而生,作为以地域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乡土观念对此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祭祀与丧葬两个方面。于前者而言,乡土神成为移民会馆的集体象征;于后者而言,移民会馆逐渐形成互助机制。随着东北地区的发展与外敌的侵略,移民会馆逐渐衰微,乡土观念作为其内核则在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促动民族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乡土观念;近代;东北地区;移民会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4)21-007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1.022

会馆出现于明清时期,是服务于客居异乡之同乡的地缘性社会组织。起初,会馆主要设于都城,面向赴京参加科举的学子,在商品经济的促动下,各大商业重镇逐渐出现针对商贸活动的会馆。及至晚清,东北弛禁,大批关内移民涌向此地,有别于传统会馆的东北移民会馆由此兴盛,是东北移民史中不可忽视的关捩。更进一步看,乡土观念深植于东北移民的精神世界,在与东北地域文化、晚清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动态交互过程中对东北移民会馆的沿革、发展起到重要形塑作用,具备丰富的研究价值。

关于近代会馆的发展,当下学界已形成一定研究成果。窦季良的《同乡组织之研究》以重庆一地为重,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化、集体象征、功能分析等方面对包括会馆在内的同乡组织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1]何炳棣的《中国会馆史论》思籍观念的视阈下北京郡邑会馆的起源与演变,并考索各地会馆的分布图谱。^[2]王日根的《中国会馆史》以宏观视角俯瞰中国会馆的嬗变脉络、地域差异、功能机制及文化内蕴。^[3]以上研究成果构建了会馆研究的整体框架,为进一步的研究导夫先路。然而,东北移民会馆作为会馆研究以及东北移民研究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学界对此问津者寡,除范立君《清代东北移民会馆的兴起与近代转型》一文梳理其发展脉络、转型历程及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外^[4],并无研究成果涉足于此,故而相关研究依旧存在较大空间。

一、中国人的乡土观念

(一)乡土观念的概念

恋土怀乡,人皆有之,然而中华民族的乡土情结更为深重。我国自春秋时即有“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之说,各地区间风俗、方言有别,是乡土观念深厚的关捩之一,两个地区的人们在一起时,同地区的人之间自然是说着他们本地区特有的方言,谈论着他们共同生活过的环境、食物、文化和人物,同地区的人便会有同乡间特有的情谊,便是乡土观念,这种观念是在两千年以来礼教、文化、方言和特殊

行政法规与制度长期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一直以来实行封建土地所有制,人们生活需要依靠土地,因此土地在国人中的地位很高。^[5]土地属于固定资产,所有者以此为生,世代相传,以便生产。多年来根深蒂固的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人们对土地都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甚至深化为感激和崇拜,这就是深深的乡土观念。

乡土自然环境是乡土观念的重要来源,是所谓“儿时钓游之地”和“祖宗庐墓之乡”的所在。那里的山川原野、涧谷溪流的特有风光和季候寒暖、霜风雨雪的特征,都是其乡土人自儿时起的回忆。这些事物的表象与意义在经历长时间的沉淀后深深的投射于内心,产生留恋。所谓“故园风物”大多是这些乡土自然环境的事物。一旦抛开了这些故园风物,走至陌生的异乡,目睹异乡不同或类似的风物,便会触起回忆,从而思念着故乡。由乡土自然环境、社会关系、文化性格与地缘性历史传统共同促成的乡土观念是同乡组织精神层面上的支柱,在他乡面对有别于乡土的异质因素时便会激发^{[1][11]},故而当同乡人在陌生的环境下相逢时,这种观念带来的情感尤为强烈。

(二)乡土观念对近代东北客籍商人的影响

“雅会集江扬,快海上鸥盟来依北塞,德星聚溟渤,幸客中燕集同话南邦”“偶现宰官身,待看满县皆花,把酒共邀辽海月,同为羁旅客,休道劳人似草,登楼闲话秣陵春”^{[5][172]}这两幅楹联来自营口三江会馆,1887年,由三江同乡所建。离开家乡的人们奔赴千里来到同一个地方生活,看到熟悉的景象,往往会联想到家乡的风光,正是这种对乡土的留恋,使得有相同背景的异乡人汇聚到一起。

乡土特有的文化陶冶每一个乡土人。因此同乡人有着共同的生活习惯、信仰、方言,一旦离开了乡土,与异乡的特有文化相接时,例如不同的饮食习惯、听不懂的方言以及不同的文化追求,面对这些不同,乡土观念便觉醒起来,因而,这些“同为羁旅客”聚在一起“把酒共邀辽海月”,也算

给予孤独的心以慰藉。这些来到东北的商人于是建立起供同乡人交往的移民会馆。

二、东北移民会馆概况

(一)会馆的文化内涵

依据目前发掘的史料大致可以确定会馆的出现最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置的芜湖会馆:“京都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漠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6]

《辞海》以“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定义“会馆”。而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其旨归是“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4]。狭义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会馆则指同乡组织。

会馆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有着密切联系,会馆的建立需要资金的支持,因此商人在会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会馆形式各式各样,比较常见的是由同乡商人结合而成的“商帮”。同乡又同业的背景使他们在对抗土著商人和其他籍商人方面联合起来,互帮互助,有助于维护他们的利益,久而久之,集中在一个地域的同乡人愈来愈多,会馆正式成型。会馆通过选举产生主持会务的“会首”,选举产生的人一般要具备足够的资格例如年长或有突出的财务贡献,各地会馆的会首往往是大商号经理人。

明中叶到清代咸同时期各类会馆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会馆类型大致分为试馆、商业会馆和移民会馆。例如明中叶以后,京师会馆大多服务于科举考试,在地方主义大行其是的时代,官员期待更多的同乡子弟登科入朝,以为党助。服务于商贸活动的商业会馆则与此大相径庭。而移民会馆以带有文化、娱乐色彩的同乡聚会活动为主,这既可以敦睦乡谊,还可以帮助移民更快地适应异乡生活^{[7]281}。清代后大量关内移民移入东北,东北地区会馆类型主要是供同乡人联络感情的移民会馆。

(二)东北会馆概况

清入关以后,统治者控制着东北地区丰富的特产和资源,认为盛京、吉林是满族的根本之地、清朝的龙兴之地,土地应归于旗人。经过清朝两百多年的封禁,东北地区的生态平衡得到了保护和修复,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正是适合开垦耕种的地方,吸引了大量流民来此开垦。到了咸丰年间,东北封禁政策逐渐松弛,1885年封禁令废除。弛禁的主要原因在于封禁政策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东北地区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本来就落后于中原沿海,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严重阻碍着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从顺治年间的约七千万人到道光年间增长到了四亿人,中原地区耕地面积不足造成了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清政府只好将中原地区的人民向北迁移。除此之外,咸丰朝以来,中国被迫同沙俄签订了《璦琿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要支付给列强的赔款数

额过高,在国家经济捉襟见肘的条件下清朝不得不扩大经济发展领域,开垦东北。诸多大臣思考解决流民问题的方法,接连不断上奏移民实边的建议。清廷对东北从局部弛禁开始渐渐全面开放,数以千万的移民走进了东北,并在这里繁衍生息。这其中也包括不在少数的商业移民,东北地区的商业移民以河北、山东、河南为主,并将他们原有的经营模式带到了东北地区,在逆境中依靠智慧自身发展。

汉人迁来以前,吉林地广人稀,需供简单,营商渔猎没有显然的界划,自然也没有特定的商人。自清嘉庆、道光以后,越来越多的内地人迁来东北,日常需品的种类数量与之俱增,需要特定的人和组织来经营商业。但是来到东北的人们大多是实在贫困得无法维持生活才被迫迁到东北来的,这些人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更不用谈经营商业了,于是直、鲁、晋、豫、苏、浙、广等地商人乘机来东北投资,因此东北的商人基本都是客籍。

在东北这样一个移民占大多数的地区,移民会馆随之兴起。一方面,远离家乡的同乡人需要一个互相交流可以联络同乡情谊的组织,营造共同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中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根深蒂固,对外乡人的猜忌与偏见,催生出诸多矛盾,在土著商人和客籍商人之间也是这样,因此建立会馆可以形成组织与土著商人和当地官府进行有效沟通。此外,还便于对贫苦的同乡人施以援手。由于移民本身带有商业性,与都市和工商市镇的商业会馆目标相同,但移民从事的生产多数是开发性的,所以与商业会馆并不相同,具有自己的特色。

根据范立君老师在《清代东北移民会馆的兴起与近代转型》对清代东北地区移民会馆的整理,可以看出:东北的移民会馆大多以庙、寺、宫、观为名存在,例如康熙二十年晋商在海城兴建的山西会馆为关帝庙,在盖州的山西会馆为关岳庙,辽阳、朝阳、铁岭、岫岩、新民、吉林的山西会馆为关帝庙;在海城、辽阳、金州、岫岩的山东会馆为天后宫;在盖州的山东会馆和福建会馆为北海神庙;在辽阳的河南会馆为娘娘庙;辽阳的直隶会馆为财神庙;沈阳的浙江会馆为珠林寺。从资料中可看出移民会馆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商业发展。及至明清,海洋贸易兴起,闽浙商贾纷纷远赴东北,相关移民会馆由此兴起,如三江会馆的原型天后宫等。^[4]

三、移民会馆的功能

移民会馆的存在对于维护移民在客居地的利益、化解移民与土著民的矛盾、联谊同乡情谊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也是一种民众自发的组织。

祭祀与丧葬是移民会馆的两大主要功能,我国旧籍所载有所谓三大事,“食”“丧”“祭”。居于首位的食自然因为“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生存的必需品。而“丧”“祭”两项,则是渊源于我国的伦理和神道。“祭”以表示对故者报恩崇德的虔敬,“丧”是人的“大事”,所谓“亲丧固所自尽也”。同乡人有共同的神明信仰,因此会馆共祀神明、同祭

祖先。祭祀源于先民敬天畏神与怀祖的心理，在大传统与小传统动态交互的过程中，源于儒家的礼乐文化逐渐渗透至生民日用之间。

（一）移民会馆的集体象征——乡土神

具体事物经过客观社会实际与先民文化性格的删汰，逐渐符号化、抽象化，成为集体象征，是为人群组织的团结的徽志。同乡组织的集体象征是为同乡人所集体认同的徽志，具备凝聚人心的功用^{[1]130}。人们背井离乡后，多入乡随俗，诸多乡土习俗均与当地风俗融为一体，唯独最具特殊性者能够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下不改本色，同乡组织所祭祀的“乡土神”便为个中典例。

所谓“乡土神”指同乡人在家乡共同供奉的神灵，离乡寄居后也仍然共同供奉。在清代，客商“去父母之邦”而“营利于千里之外”，福祸难料，未知的恐惧促动其求庇于神灵。^[8]商人们出行前、出行中会对妈祖和马云爷马神进行多次供奉祭拜以求出行安全。此外，经商者所畏惧的便是亏损甚至破产，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最担心的情况就是经营亏损甚至破产，故此商人热衷于举行供奉财神、行业神的诸多仪式以示虔诚。

移民会馆供奉信仰的多为乡土神、守护神。就以财神为例，人们生存发展必须依赖金钱，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此，商人供奉财神是需要精神上得到庇护。例如东北地区的山西会馆多以“关帝庙”命名，因为作为山西人的关羽既是信义的象征，又是可以带来财的财神，而晋商经商又以树立信义为第一要素，所以关帝成为晋商首拜的庇护神。晋商的蓬勃发展，与其信奉关公，以忠诚信义为本的原则密不可分。并且建立在民间信仰基础上的会馆神灵相比于法律对人的道德约束力更为强大。

“乡土神”得以单独的自然的遗留下来，成为同乡的集体象征，这与宗教、神道以及文化保守是有很大关系的。神话流传和仪式的固定化使得人群生活的中心是神。而“乡土神”对于他们的生活更加贴近，影响他们的程度也最大，“乡土神”便这样的被遗留下来，选择下来，成为同乡组织的集体象征^{[1]132}。

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同一个神灵会为不同省份会馆所供奉，例如锦州的三江会馆和岫岩的山东会馆都是天后宫。天后宫所供奉的是林默娘，她是宋代福建湄洲屿的一个女子，传说她通水性并熟知海洋变化的气象规律，又乐于助人，多次救助海难的乡亲与海上过往船商，在一次海难中身亡。人们尊奉其为海上保护神的“妈祖”神灵，会馆亦加以供奉希望借助神灵的护佑，使在客居地的商众平安。自康熙来多次受治国者的褒封。人们逐渐把她奉之为神，顶礼膜拜。这也是多个会馆都供奉同一个神灵的缘故。

（二）移民会馆对同乡人的互助功能

在移民中有不少因病因灾沦为贫弱、孤苦的同乡人，会馆共同出资帮扶病弱者或举行丧葬，这是会馆救济功能的体现。我国的丧葬文化源远流长。自殷商以来，统治者均给

予丧葬礼仪以高度重视，《仪礼》作为三礼之一，为当时贵族从丧至葬的诸多环节设立严密周详的规范。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也与血统观念联系紧密，人们最早以家族聚族而居，因此为了让亡魂能如生者般聚而不散，聚族而葬的风俗应运而生。据《周礼·春官》所载，当时各个家族设有专掌族墓的冢人及专管邦墓之域的墓大夫。及至今日，人们仍然信奉“落叶归根”的古早命题。^[7]在异地的同乡人士对于祭祀和丧葬尤感其迫切，恐怕旅居在外“葬无所归，祭无所赖”。如“浙江会馆”的“敦义庄”、施送棺木的“江南会馆”。还有同乡死丧的吊唁，如“江西会馆”规定“阁人家如有死丧，不必论家尊，但除20岁以下不计外，凡男女成丧者俱着住持待吊，膊以二金，少尽乡情。如住持失闻而丧家自来称报者，亦宜补助”^{[1]143}。

梁漱溟有言：“离开家族的人们没有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他们仍然需要家族的拟制形态。”会馆就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摹本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3]451}。会馆所树立的精神支柱是乡土神以及会馆的创业者，要求众会员既能保存本乡传统，又能适应社会变迁。满足同乡人在外籍寻找乡情依托的需要，也能成为同乡人走向仕途时可以依靠的团体。

从清末东北移民态势的角度看，东北移民会馆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而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乡土观念又说明东北移民会馆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关内移民走出榆关后，逐渐在东北扎下根系，具备一定原住民的心态，不再以“他者”的视角凝视此地。外敌寇边以来，东北移民会馆逐渐衰微，但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发展，渐趋觉醒的中华民族意识与东北移民复杂的乡土观念不断融合，其精神内质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

参考文献：

- [1] 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组织卷[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 [2]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3] 王日根. 中国会馆史[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8.
- [4] 范立君. 清代东北移民会馆的兴起与近代转型[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 28-34.
- [5] 李伟. 山东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的变化[J]. 史学月刊, 2005, (09): 103-107.
- [6] 解维汉编选. 中国衙署会馆楹联精选[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172.
- [7] 余谊密主修, 鲍实总纂. (民国) 芜湖县志·卷十三[0]. 民国八年石印本: 1a.
- [8] 靳凤林. 死亡与中国的丧葬文化[J]. 北方论丛, 1996, (5): 22-27.

作者简介：

韩佳利，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